

迎接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飞跃

吴心伯

作者简介 吴心伯,1966年生于安徽。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本科,1992年1月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94年1月到1995年2月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出版论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6—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译著《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国内及美、日、印等国发表论文十余篇,近年来先后应邀参加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美国国防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国际会议。现为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和亚太问题的研究。

同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19年5月30日,出席巴黎和会的美英代表同意在各自国家建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术机构,这一天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的生日。经过大半个世纪国际舞台风风雨雨的洗礼,这门年轻的学科已逐渐成长起来,在世纪之交,它正面临着另一次飞跃。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学经历了第一次大发展。政治方面,联合国及其它众多国际组织的问世,一系列国际机制的建立,第三世界的兴起,大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经济上,对相互依存和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拓宽了国际关系学的视野;在军事领域,对核战争理论、均势战略和遏制战略的探讨,使国际安全理论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作为一门以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生命力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跟踪国际形势的步伐,研究其发展与变化的规律,作出理论上的归纳与整理,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使命所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对国际关系研究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笔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学应该重视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全球化问题。全球化现象非今日始,它是6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和科技革命的产物。但在冷战时代,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极体制的制约。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浪潮正波及到地球村的每个角落,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所称,“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研究全球化的现象和本质,分析它对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 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当务之急。

软安全问题。冷战时期,军事对抗是国际安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软安全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毒品走私,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等等,在性质上与传统的软安全问题迥然不同,解决这些问题也非单个国家力所能及。怎样有效地对付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这些都是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的课题。

区域经济、政治一体化问题。地区经济一体化在冷战时代便已开花,但直到冷战结束才结出果实,这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加快了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东盟国家计划在2000年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在1994年的印尼会议上通过了发达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区域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茂物宣言”。与经济一体化相随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联合。西欧诸国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接近,政治一体化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列。东南亚国家也提出了组建“东南亚共同体”的构想,其目的是建立类似欧洲联盟的区域内国家关系网,在21世

纪发挥政治、经济、文化和道义上的重要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地区经济、政治一体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改变了区域内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且对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者——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可以设想,进入 21 世纪,区域联合体将成为超国家行为主体的重要形式,在国际政治中与国家主体平分秋色。

主权问题。自从 1586 年法国思想家让·布丹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学说以后,主权就被视为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关主权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并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被肯定下来。《联合国宪章》即明确宣示了“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是正象民族国家只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一样,主权也有它的时代性。自 60 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传统的主权观也受到冲击。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国际化趋势正对国家主权构成以下几方面的挑战:主权实体界限受到由不同协议分别成立的专门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的约束;新的国际生产和劳动分工的潜在威胁;非正式的、超官方的国际交换形式和非法交易的挑战;跨国公司的挑战;金融国际化和税收国际化的挑战^①。对全球化时代主权的适用性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主权过时论”,另一种是“主权不变论”,还有一种则认为主权的概念要保留,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有更多的限制。对这个问题要做更多的实证和客观的研究。

以上是对国际关系学研究内容的一些看法。就中国学者而言,我以为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重实证研究而轻理论研究。浏览国内有关国际问题的论著,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研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的,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实在太少,而在这些数量有限的文章中,多数又是介绍、评价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理论研究,而在中国,则是实证研究的天下。一个国家有无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既反映了它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也反映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来愈重要作用的大国,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的学者应该用这些理论去研究世界和解释世界。第二个问题是研究方法单一。6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学领域曾出现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之争。论战的结果是科学行为主义所主张的整体研究、策略研究和定量研究进入国际关系学界,模式分析、博弈分析、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些方法的长处是有较强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准确性。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大多还是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历史的、政治的、法律的)分析国际问题,由于研究方法单一,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或立论不足,说服力不充分,或因角度不同,各执一辞,难以形成共识。

学科要发展,学者是关键。研究者一方面要密切跟踪和研究国际政治的最新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定位、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这一点往往是对学者最大的挑战。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格雷格·马斯泰尔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一代学者的事业是建立在探讨冷战问题——如军备控制、核战争理论和遏制苏联——的基础上的,“既然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学者是不是化智力之剑为学术之犁,转而重视诸如生活标准或经济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之类的问题了呢?能这样做也许是很理想的,但是,找出一些新理由,继续干老行当却容易得多。”^②在中国,不难发现类似的迹象。坦率地说,大多数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最后,对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来说,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面前,不仅要站得高、看得远,认清时代大势,把握世界潮流,更要有学术勇气,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做违心之论,不发虚妄之言。这是一切学术的灵魂。

^① 泽夏:“经济国际化趋势对国家主权构成的挑战,”《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3 期。

^② 格雷格·马斯泰尔:“收起冷战思想”,《商业日报》1996 年 9 月 20 日。